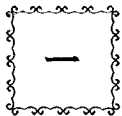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易学智慧	(1)
(一)神秘的《周易》	(1)
(二)极深研几 ——《周易》的思维形式	(14)
(三)夫子嗜《易》，韦编三绝 ——历代《易》学轶事	(28)
(四)两派六宗 ——《易》学史巡礼	(45)
(五)《易》道散论	(59)
(六)《周易》的人生哲学	(83)
二、玄学智慧	(98)
(一)玄学渊源	(100)
(二)正始之音	(114)
(三)竹林诸贤	(132)
(四)两晋玄风	(164)
三、释学智慧	(191)
(一)士大夫奉佛概观	(191)
(二)士大夫的佛教活动	(214)
(三)说有谈空	(239)

(四)佛教与文学	(251)
(五)佛陀的智慧	(257)
四、道教智慧	(277)
(一)道纪宏开两千载	(278)
(二)道教的宇宙论和人生论	(297)
(三)道教的人生思想	(316)
(四)道教与古代中国的科技和文化	(332)
附识	(345)



易学智慧

(一) 神秘的《周易》

举中国三千年之学术，不外道学与儒学互相颉颃而已。先秦时期，尤以孔子、老子为二大宗师，而儒道二学之思想精髓，则在乎《周易》与《老子》二书之中。人或曰：老子重道，究乎形而上者，故言“无”言“虚”，讲“道”“德”，讲“无为”；孔子重人，究乎形而下者，故言“仁”言“义”，兴礼乐，致教化。不过，孔子并非不讲“道”，更不是不知“道”。《周易》之中兼“天道、地道、人道”言之，故为体大思精、系统纯粹之宝典，因而为百世所尊，万民共仰。唯其为世人所尊所习，故易生神秘，易生虚妄，易致糊涂。故于学习《周易》智慧之前，当先对《周易》知识有所了解，以便正确对待其神秘性问题。

1. 从“三易”到《周易》

相传上古社会，中国有三部易书，号称“三易”。《周礼

·春官》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汉人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易赞》及《易论》）“三易”，分别是夏、商、周三代的易书。三易今天仅存《周易》，其他两书都已失传（后之传者，皆为伪托），内容如何不可得而详。根据《周礼》及汉人注得知：三易都有八个基本的“经卦”和六十四个衍生的“别卦”，它们的区别在于卦序和卦爻辞的不同。

《连山》易以艮卦居首，艮为山，艮与艮重，象征山与山相连，故曰《连山》。郑玄则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亦可备一说。《归藏》，孔子称之为“坤乾”，以坤卦居首，坤卦象地，地为万物所归所藏，故叫《归藏》。郑玄曰：“《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与此正合。《周易》的“周”是朝代名，“易”是书名，故朱熹注《周易》开章便说：“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周易》即周代的易书。郑玄又说：“《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亦可成说。《周易》卦序以乾卦居首，坤卦次之。乾是万物得以孕育的开始，坤是万物赖以生成的母体。一为种子，一为土壤。金景芳师说，殷道贵慈，重母统，故其易首坤而次乾；周道贵刚，重父统，故其易首乾而次坤。可谓不刊之论。《归藏》与《周易》卦序的区别，正好反映了从原始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转变的历史实际。结合民族学资料，三易的卦序，也许还与古代社会生产形式的演变有关。《连山》重山，当是先民狩猎

于山林的记忆；《归藏》重地，当是进入农业社会后先民对土地的眷恋；《周易》首乾次坤，当与农业社会对天文的观测有密切关系。三易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是从狩猎到农业，从对大地的直观感受，到对天文现象的考察的文化结晶。

2. 神秘的《周易》

《连山》、《归藏》早佚，《周易》则历数千年而不衰，甚至进入二十世纪后，还有传演愈盛之势。《易经》作为儒家“六经”中最古老的经典，成为儒家思想的古老渊源，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一部古籍对文化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找不出第二例。当然，《周易》之所以在历史上具有这样重大的影响，仅仅靠反映古代社会生活是不够的，这主要恐怕还在于披在它身上的神圣性、神秘性和神奇性的外衣起了作用。

“神圣性”是就其作者而言。东汉大史学家班固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三圣，即伏羲、文王、孔子；三古即上古、中古、下古。班固简明扼要地说明：《易经》成书经过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期，是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的共同创作。具体说，即是“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孔颖达语）。这些说法，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也不是没有依据。

伏羲制卦：《周易·系辞下》篇说：“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

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就是伏羲画八卦的经典证据。

文王系辞：《系辞下》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司马迁也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报任安书》）周文王有盛德，却被纣王囚于羑里，这就是有“忧患”；文王生当殷朝末年，相对於伏羲氏的上古之世和春秋战国的近古之世，就是“中古”，在时间上和身份上都是合适的。文王演《易》的内容，有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即“重卦”）和撰著卦爻辞（即“系辞”）两说。根据上引《周礼》关于“三易”“经卦皆八，别卦六十有四”之说，可见在文王之前的夏殷时期，《连山》、《归藏》二易已经有了八卦和由八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故文王重卦说讲不通。孔颖达说：所谓“易之兴”，是指《易》道的发扬光大，即撰著“《易》之卦爻辞”，则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易经》卦爻辞的拟定，是文王完成的。不过，细考爻辞，有文王以后的内容，故又有周公撰爻辞之说。周公是文王的儿子，父亲可以总揽儿子的功绩，因此只数文王，不数周公。《左传》记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宣子通过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可见说《周易》与周公有关，是有依据的。

孔子作十翼：“十翼”即十篇解《易》的文字，汉人称之

为“易大传”。最早记载孔子作十翼的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相同的记载还见于汉人的许多著作之中。《彖》、《系》、《象》、《说卦》、《文言》等都是《易大传》的篇目，其中《彖》、《系》、《象》各分上下篇，外加《史记》失载的《序卦》、《杂卦》两篇，共为十篇，因其阐释《易经》，犹鸟之有翼，故称“十翼”。

伏羲、文王是“圣王”，孔子是圣人，虽未作王，却有“素王”之称。一部《周易》既然“世历三古”，就说明它历时悠久，经过千锤百炼；既然“人更三圣”，就说明它智慧奇特，是众圣智慧结晶。《周易》是在历史长河中锤炼并经过历代圣人精心制作的经典，它的出现本身就具有特别神圣的意义。

“神秘性”是就《易经》的内容说的，“神奇性”是就《易经》的实用性说的。神秘为体，神奇为用，两者有区别，但也有联系。前人每曰：“《易》本卜筮之书”，《庄子》则曰：“《易》以道阴阳”。前说得《易》之“用”，后说得《易》之“体”；前说为《易》之“术”，后说为《易》之“学”。“学术”“学术”，任何具有生命力的学问都必须具备“学”和“术”、“体”和“用”的两重性，这才具有学问性和操作性。“学”是原理，“术”是应用。如果高深的理论失去了可应用性、可操作性，曲高和寡，这就注定其不具有普及性，也就决定其不能长久行于世间。就像宗教一样，只有既具有高深

玄远的理论，同时又具有具体运作的价值，才是优秀的宗教。《周易》之受宠于中国士大夫文人，也正是因为它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价值。在《易》学早期历史上，《易经》是以阴阳为内容来占筮吉凶的书籍。

《易大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反映了《易经》作者的宇宙观。两仪即阴阳，天地为其代表；四象即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四时为其代表。在作《易》者看来，天地万物、宇宙洪荒，无不根基于“太极”，肇始于阴阳。自太极而剖分为阴阳，自阴阳而形成天地；又自阴阳而演化为四象，流为四时。自天地运行、阴阳合气、四时化生，然后万事万物得以化成。为了表现这一宇宙生成图式，易作者用“—”代表阳，用“--”代表阴；两之以为四象，三之以为八卦；八卦相配（相摩、相荡）即为六十四卦，以代表万物。既然天地万物皆是阴阳运行摩荡的产物，那么阴阳的流行、消长，自然也会影响事物的穷通利屯。植根于这种认识，人们便运用卦象变化、爻位升降的原理，来判断吉凶，预知祸福。《易大传》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如引“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又说：“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系辞上》）所谓“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都是讲《易经》在内容上蕴含有丰富的

原理，这是讲《易经》“学”的一面。所谓“开物成务”、“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则是讲《易经》具有实际的运用价值，这是讲《易经》“术”的一面。“学”与“术”、“体”与“用”的结合，就是《易经》的特点，也是《易经》广为流传的根本原因。

具体地讲，《易经》原理性的内容，主要表现于卦上；而《易经》运用性的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占筮之上。《系辞》又说：“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智）”；“神以知来，知（智）以藏往。”“蓍”，即蓍草，用于筮占；“卦”，即六十四卦，包括卦象、爻位以及卦爻辞。“卦”蕴藏着已有的知识和智慧，比较固定，其德为“方”；而“蓍”则预示着未来的趋势和事业，神变无方，其德为“圆”。“卦”即《易》之“学”，“蓍”即《易》之“术”。换句话说，《易经》的理论在“卦”，《易经》的运用则在“蓍”。

短短一部《易经》（就是加上“十翼”也才六千余言），运用它特有的符号和语言，竟然包罗万有（“天之道”与“民之故”、“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实在是举世无双的“神秘”经典！而《易经》采用阴阳对立统一原理，组成了卦爻结构和神变无方的筮占体系，可以察往知来，知变知几，开物成务，定天下大业，这难道不“神异”吗？

《易经》是古代中国认识世界的教科书，也是古代士大夫们获得智慧启迪的“启示录”。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首先在于它本身具有对世界万物的概括性和模拟性。《周易·系

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世间知识，不外乎“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两大类，自古及今，从中到外，除了内容的全面和正确与否外，在范围上讲，概莫能外。《易经》将这些知识分别概括为“天道、地道、人道”，而这些举人类无以异的所谓“道”，则完完全全地蕴含在“广大悉备”的《易经》之中。《系辞上》篇也常常说，《易经》的内容与天地之道齐准，反映着自然和社会的衍进规律，人们从《易经》中可以获得天道的训示、政治的指导和生活的启迪。如果按照《易经》精神办事，就可以做到“不违”、“不过”、“不流”、“不忧”、“不遗”，应变于无穷^①。当然，《系辞》作者这样说，也许太夸张了些，《易经》毕竟是人制作的，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如此天衣无缝、周知曲成。但是，《易经》毕竟“世历三古，人更三圣”，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检验，也得到了历代圣人的不断改进，其中反映了许多自然和社会的带根本性的规律，也具有许多人生智慧的哲理，因此，它无论在思想方法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对后人都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于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无论是出于玄想渺思的需

^① 《周易·系辞上》：“《易》与天地准（齐），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要，还是出于生活智慧的渴求，或是出于引经据典的需要，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易经》产生浓厚兴趣，并对《易经》原理大加称引。

3. 观象玩辞

儒家经典与宗教圣经讲述神功异迹、清规戒律不一样，她是先民经验的实录，具有可实践性。《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也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外，荀子、董仲舒、司马迁等人都对“六经”的功用作过类似的阐述。概言之，《诗经》用以表情达意，抒发内心情感；《书经》叙述先王政事，具有历史经验；《礼经》记载行为规范，节制言谈举止；《乐经》渲染和乐之情，激发好善乐施之心；《易经》阐发阴阳运行，以明变化之理；《春秋》反映等级名份，实为礼义之大防。“六经”在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共同完成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缺一不可，故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董仲舒说“六学皆大”。而内中又以《易经》结构最为独特，最堪观玩。

如前所云，《易经》“体”“用”兼具、“学”“术”并存，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因此数千年来中国士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和目的，对《易经》进行了不懈的学习和钻研。他们有的根据《易》理来寄托玄想与奇思，从事自然世界和人

类社会的理论研究；有的则利用《易经》来占断吉凶，预测未来，从事知几察微的实用探讨。数千年来，人们或者从《易经》中寻找灵感和启示，以求思维和想象的源头活水；或者将自己的思想寄托于《易经》之中，以求传世行远，附骥千里。古往今来，《易经》的注本不下于三千多种，没有任何一本经典获得过这样的幸运，也没有任何一门学问赢得人们如此普遍的醉心。而中国历史上凡属从事思辨和伦理的思想和学术，也无一不受惠于广大的《易》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抑或是政治、军事、医学、伦理、家庭、社会，盖无一不受《易》理的影响，无一不浸润于《易》道之中。举瀛海之内学术无非《易》学，通上下古今著作无非《易》著，《易》道磅礴于四海，涵盖于古今。如影之随人，《易》学无时不与中国人的思想学术连在一起。

如上所述，《易经》之所以独行无碍，流行越盛，在于它的“神圣性、神秘性、神奇性”，而所谓“神圣、神秘、神奇”三性之获得，则端在于《易经》“辞、变、象、占”的特殊结构。

《系辞上》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又说：“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辞，即语言文字；变，即阴阳爻位变化；象，即卦形物

象；占，即占验断语。《易大传》曾论圣人创作《周易》的意图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设卦，是指用阴阳爻画组成卦体；观象，是指卦形对物象的模拟；系辞，指卦辞爻辞等文字说明；明吉凶，是指“吉凶悔咎”等占辞断语；变化，指爻位升降（刚柔相推）预示事物发展变化。根据《易大传》所谓伏羲氏仰观俯察的记载，八卦是伏羲氏通过对天文地理的观察，和对鸟兽百物以及人身之形的模仿画成的，此之谓“观象”、“设卦”。既作八卦，复重为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本来在八卦和六十四卦中即已蕴含了神明、万物之理了，但是文王还担心人们不能理解，又于每卦之下，每爻之上，加以语言文字说明，对每卦每爻的吉凶意义进行具体说明，如“吉、凶、悔、吝、利、厉、无咎”等占语，此即“系辞”“明吉凶”。对卦爻吉凶的判断，又不是凭空加上去的，而是根据阴阳爻在卦中位置的升降和推衍，使卦德产生了变化，根据阴阳的盛衰和流衍，而作出事业吉凶的判断，这就是“刚柔（阴阳）相推而生变化”。从观象、设卦、系辞、变化这一系列过程，才完成圣人作《易经》的伟大工程，从而形成“辞、变、象、占”四道相辅相成的《易经》结构。

“辞、象、变、占”是构成《周易》的四大要素，它们各有特点，各有作用，各有专主，也各有适应范围，可以从不同方面满足学《易》之人的不同要求。古代士人在从事《易》学研究（或参照《易》学原理进行生活）时，就是围绕

这四大要素进行的，由是而有“四尚”的产生。也即是说：学《易》之人，从事理论创造者就崇尚其言辞，以便从卦爻辞中吸取教训；从事器物制作者则崇尚其卦象，以便从卦象中获得造物制器的启示；从事圣人之业者则崇尚其变化消息；以便从几微之中获得事物发展变化的启迪；从事占筮预测者则崇尚其占断，以便从吉凶的预测中接受神的启示。这样一来，《易经》就成了“计算机”式的资料库、信息源，人们输入不同的主题词即可获得必要的教诲和启迪。《易经》犹之乎大江大湖，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量腹取足，不穷不竭。《易大传》关于“四道”、“四尚”的论述，不仅告诉我们《易经》从“辞象变占”四个方面给人以帮助，而且告诉我们：正确的学《易》态度应该是“观”和“玩”。虽然“作《易》者”不能没有“忧患”，但是学《易》用《易》者却十分悠闲而自得，一点也不烦苦。为什么呢？因为《周易》是一部古代的知识渊藪、经验宝库，其内容“与天地准”，具有“弥纶天地之道”的大智大慧，人们通过学习《周易》就不难获得生活的启迪和事业的帮助。《易》之“四道”，“辞”是预言和警句，多是先民的经验之谈和圣人的哲言睿语，包含着无限先知先觉的智慧格言，是学人从事理论研究和原理阐释的文字根据。“象”即物象，是人们制作器物的依样“葫芦”。“变”乃阴阳爻位升降，预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征兆。“占”是“吉、凶”的告戒。其间奥理无穷，神妙无方，以乐易的精神状态观之玩之，便可轻松地获得教益。故学《易》者可以优哉游哉，平

易和乐，而所得并不为少。

“四道”之中，“辞”、“象”是一组，是观察参验的理智之路，玩辞观象即可运用《周易》原理进行理论思维和器物制作。“变”与“占”是一组，是几微神秘之道，通过预测占算推测未来。古人分《易》学为“义理”和“象数”两派，盖渊源于《易经》本自具有的结构和内容，洵有见地。而今人所谓“人文《易》”、“科学《易》”和“神道《易》”，又赋予《易》学无限新姿。所谓“人文《易》”即“尚辞”之立言派，他们援据《易经》格言隽语，从事理论创造。所谓“科学《易》”即“尚象”之制器派，它是古代社会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科学”，虽然不能与现代科学相比，但却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科学”成就。所谓“神道《易》”即察几微，讲占筮，它是古人运用神秘手段认识社会，预知未来的方法。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的《易》学生活，基本上是沿着这四条路子走的：他们或者用《易》之辞来引发高论，或者以《易》之象来产生科学奇想，或者从《易》之变获得先知先觉，或者以《易》之占来预测未来。从而充实了士大夫们精神生活的空间，填补了士大夫们行为迷茫时的空白。

《易经》的神圣性，决定了它具有与众不同的、使人刮目相待的特殊身份；《易经》的神秘性，决定了它具有令人醉心、令人玩索的无穷价值；《易经》的神异性，决定了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必然受到人们普遍欢迎和厚爱。中国士人无论是出于对天地自然的玄想，还是出于对世道人生的思索，抑或

是出于对未来世界的预知,《易经》都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无怪乎其在中国历史上独受青睐而久行不衰了。

(二) 极深研几——《周易》的思维形式

《易经》是怎样影响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易经》以什么内容和方式影响中国文化呢?中国士大夫们又是怎样从《易经》中吸取智慧呢?一个是“思想方法”,一个是“思想内容”。下面一节,我们将专门讲《周易》思想内容对国人的影响,这一节我们讲《易经》在“思想方法”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思想方法,通常称为“思维方式”,它是人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认知方法,也是人们用以指导实践并检验结果的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形态千差万别,除了发展水平的差异外,其中各民族之间思想方法的不同,才是导致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一位自学《易经》的朋友曾感慨道:“思维乃人类之特征,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关键所在,全部人类文明皆本乎此,诸多文化之流皆源于此,种种奥妙玄迹亦出乎此。大矣哉,思维之道!”又说:“纵横观之,人类奥秘之处唯思维而已。不同文化现象,多样的文明成果,其原因在于思维方法的不同和思想观点的差异。”(张正春《易经之思维与思维之易经》,中国·广州1995年1月“国际易学思维与当代文明研讨会”论文)

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举世无双的特色，就在于它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则端赖《易经》思维模式的影响。《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被奉为六经之首！数千年来，《易》学一脉，传承不衰，以其“生生”之义，“日新”之德，灌注了中国文化灿烂之花，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智慧之果。而这种灌注与孕育又端赖于《易经》思维对中国之士大夫思想行为的型铸与培育。中国士大夫文人，正是在《易经》思维下进行思考，用《易经》思维从事精神产品的创造，从而形成富有鲜明个性的中国文化的活的因素。因此，《易经》思维如何影响国人，国人又是如何接受《易》学思维的影响，就成了我们考察《易》文化生活的首要问题。

关于《易经》思想方法，学人们作了许多归纳和总结，朱伯昆教授主编《易学基础教程》（第五章）归纳为“直观思维、形象思维、象数思维、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罗炽等著《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一书归纳为“整体思维、循环思维、形象思维与直觉思维”（武汉出版社1994年8月版）；还有的学者说《易经》思维有“整体思维、经验思维、象数思维、辩证思维和灵感思维”（1995年1月广州《国际易学思维与当代文明研讨会论文摘要》马全智文）。根据作者们的解释和说明，“直观思维”、“灵感思维”实际与“直觉思维”相同。去其相同，取其相异，《易经》共有：直觉思维、辩证思维、形象思维、象数思维、逻辑思维、整